



研究项目：

命运、能动性及预测：东亚文化和欧洲文化中的应对策略

1. 概述

对事物未来进程的预测是人类共有的行为，各种文化中都有从事预测的活动，只是具体的方式不同。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各种对未来的预测随处可见，只是对个人或集体所谓的“命运”的探问以及应对变化的方式在人文科学中已经不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显学。与此同时，“信心”、“风险”等词汇代替了传统的命运观，只有按照一定的科学方法在一定的范围内所进行的预测才被人们接受承认。现代的“偶然性（无常、无序）”之世界观（Greven 2000）在西方文化中形成，这种现代的对世界的理解从“不定性（无常、无序）”（Gamm 1994）出发，认为人类生存中充满矛盾的双重性。得出这种结论的人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些非西方文化的社会只是部分地接受了欧洲启蒙文化的理性观念，即使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仍然具有自己独特的命运观以及应对个人或集体命运变化的策略。人们可以观察到，东亚人面对人生中的变迁沉浮拥有一种从容的态度。这种现象，有待于我们对其命运观进行研究。与西方社会相比，预测未来的各种方式在东亚对人们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健康有着更深刻的影响。

该国际项目所关注的问题，其出发点就是对人文科学中欧洲中心主义的彻底否定，东亚的学者们参与该项目则可以保证不同知识体系之间进行系统的直接交流与对话。这样，我们才能对一个貌似受文化局限的研究课题进行跨学科、跨地域的比较研究。与欧洲当前流行的研究联合体所不同的是，汉学在该项目中将具有领军的作用，而以欧洲研究为载体的学科将起到对比和补充的作用。以“能动性”为例，这一概念在东亚文化中如若存在，则其内涵可能极其广杂。为了明确地界定该概念的含义，将其与西方文化中对“能动性”的理解进行比较，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步骤（Kaelble 1999；Rothermund 2003）。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相比，欧洲的中世纪与近代早期将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料作为参照。这段历史时期，各种文化与宗教并存（如在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潮亦皆可在这个时期寻其源头。这个时期的文化史与宗教史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我们的项目拟对预测行为的历史背景展开探讨并对其发展至今的脉络进行梳理，因为预测行为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有一些因素对我们今天的“未来决策”有很深刻的影响。对于这个课题从历史的角度纵向研究是为了回答一个横向对比而提出的问题：中国或东亚的现代文化——就命运观和应对变化的策略而言——与西方的现代文化是否有所不同？

2. 项目进程

2.1 项目的主课题

关于中国的占卜文化，其源起、技法及流传，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出版（Kalinowski 1983、1986、1989、1990、1991、1994、1996、1999、2002、Harper 1988、1999、2001；Richard Smith 1991；Loewe 1988、1994；Strickmann 1977、1983、1989、1990、2002、2005）；而中国文化中的命运概念、命运观及其对中国人过去和现在的生存方式的影响，至今研究不多（傅斯年；Raphals 2002；Chen Ning 1997）。占卜术为研究中国文化中的命运和能动性的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出发点。

这个课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未来规划，应用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在支撑统治机构、国家宗教祭礼的理念（天子、天命）中，占卜预测有其一定的地位，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相应的作用，这是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我们要通过对命运观、占卜术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中国文化中的人的“能动性”和“自由意志”的问题，这是我们研究的主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将中国文化中有关的思想与欧洲思想史中众多相应的理念作比较（参见有关占卜术、奇迹的文献及《论自由意志》、《论占星术》）。古希腊罗马晚期文化以来，特别是九世纪和十六世纪，在西方拉丁语文化中对上帝的“前定”和人的“能动性”进行了讨论，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些讨论尤其不能被忽视。

世界上没有另外一种文化像中国文化那样重视占卜与预测。从公元前十三世纪流传下来的甲骨文大部分是对预言和占卜活动的纪录。儒家学派经典著作《五经》之一为《易经》即《周易》，其书集占卜所用的符号、图像而成。阴爻阳爻按一定规律组合成六十四卦画并配以卦辞、爻辞。众多线索表明，中国文化中注经传统的产生与对《易经》卦辞、爻辞的注释密不可分。在后世许多经典著作被当成预言的依据来释读（Henderson 1999）。尽管历朝历代的士大夫们对占卜的活动有不同的看法（Kalinowski 2003；Liao 2001），占卜所得的神谕往往变为政治话语的修辞（Jean Lévi 1999），但是，二十世纪前，中国的文化精英阶层是不

可能与占卜文化彻底决裂的。占卜预言是支撑中国王朝制度的意识形态（形而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占卜预言的作用与欧洲政治中的资政功能相比，这将拓宽我们的研究思路。

西方文化经历了一个有系统的逐步的启蒙过程，从十二、十三世纪对亚里斯多德哲学的接受，经过人文主义，到“现代人良心的形成”（Kittsteiner 1991），人们对个人或集体命运的可预测性的信仰从根本上被动摇。而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中，占卜预言的行为被称为“迷信”而遭摒弃，但同时，与之相关的命运问题并没有被探讨。“偶然性（无常、无序）”是西方哲学和神学范畴内的概念，是地道的西方文化的产物（Makropoulos 1997）。在中国，“偶然（无常、无序）”这个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其它概念如“风险”、“偶然”等在思想史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Giddens（1991）指出，在西方的现代社会中，“命运”或“命运之神”等词已被“风险”或“信心”等所代替。而中国文化没有经历这样彻底的演变（Raphals 2002）。一般来说，命运观以及应对变化的策略与信仰占卜术密不可分。然而我们不可忽视过去和现在都存在升华了的或是“世俗化”的占卜术，其存在与对命运的观照有很大的联系。这类预测未来的方式体现在如“天命观”或中国文化的历史观中。为了更明确了解命运观以及应变方式在东亚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中的异同，我们需要探讨另一个相关问题。在现代社会之前，欧洲文化中存在大量有关奇迹、巫术的纪录（Heinzelmann/Herbers 2002；Kiekhefer 1992），还有宗教礼拜仪式，祈祷文（Angenendt）。这些文化现象，和西方的现代化相比，对我们理解东亚文化中命运观以及应对变化的方式有什么启发？同时，这种从历史角度出发的探讨，将使我们对今天“西方社会”的“偶然性”（无常、无序）的复杂状态有更深刻的理解，尤其在当今欧洲，多元性和众多无法整合的现象（Schneidmüller 1997；Borgolte 2002；Herbers 2007）触目皆是。

儒家学派的思想中，虽然出现过带有（前定宿命论倾向的怀疑主义，但是，“世界的可认知性”的理念（韦伯称之为“乐观主义”）对中国人的命运观和应对变化的方式有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把这种思维方式与欧洲文化中的上帝前定论进行比较。中国的早期民间宗教形式，特别是对预言和占卜术的热衷，使民间宗教有别于官方的国家宗教祭礼（Mu-chou Poo 1995, 1998）。那些士大夫们的生活与他们所在地方的民间群体活动紧密相关，因此他们也参与社会其他阶层的民间宗教活动。这种行为在我们眼中是非常自相矛盾的。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大概无法对占卜活动彻底地否定和拒绝，而只能对这些活动加以政治和思想上的控

制。从西方的理性主义出发，这种行为方式前后矛盾而没有一致性。最近，学术界对此现象作了理论性的描述，称之为“复合型社会”的一大特点。这种“复合型社会”模式是对东南亚的生活方式的理论描述（Kipp 1996）。

为了探讨以上提到的问题，我们的项目将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涉及的学科有哲学、思想史、科学史、社会史、欧洲中世纪和早期近代史、宗教学、文化人类学和文学。这些学科有些致力于对文化的现状进行研究，有些致力于对文化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东亚的学者们参加我们的项目，将给我们的研究注入活力，带来我们或许意想不到的研究视角。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尽管我们把研究重点定位在中国与中世纪、早期近代欧洲的文化比较上，但是我们也会把日本（Leinss 2005、2006；Maekawa 2002；Fukasawa 1996、1997、2001、2003、2004、2007）、韩国（Andrew Kim Eungi/Lee Eun-Jeung 2003）、越南（Alexei Volkov）考虑在内。在项目进展顺利的前提下，我们也可能在项目的延续阶段把世界上其他文化纳入研究范围（如非洲、南亚、拉美）。

为了探讨命运观和应对变化的方式，我们把主课题分解为各个子课题列在下面。

2.2 围绕主课题拟定的子课题

2.2.1 哲学理论（哲学、思想史）

“命运”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在中国哲学思想中是否有“超越”和“偶然（无序、无常）”的概念，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我们也要提出一个与此相应的问题：西方社会的“超越性”意识过去和现在是如何体现的？

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些概念：命、运、性、份、缘等等。这项工作不但涉及本体论、宇宙观的知识，同时也涉及对性和命的根本关系的思考。性和命是否构成一个统一体？如果性和命构成一个不可分的“性命”统一体，而性和命只是这个统一体的两个不同方面，那么人的能动性在这个统一体内占有什么地位并以何种形式出现？在傅斯年的开创性研究（傅斯年 1952）的基础上，近来的一些学者尝试对各种“命”的概念进行划分归类：a) 由神前定的命运，b) 道德上的使命，c) 寿命，d) 天命（Chen Ning 1997）。与这类研究不同，我们着重于研究这些概念的语义范围，寻找这些“命”的概念在语义范围内的共同点。

总的来说，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强调变化的迹兆“几”和“妙”（Lackner 1992）。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万物总是处在临时的状态中而不断变化，关注的是动态的各个阶段和引起改

变的隐性因素。这种思维方式强调的是从一个状态到下一个状态的流动性的“演变”，而不是两个状态之间的“断裂”；而“断裂”则是西方文化中“偶然性（无常、无序）”概念的最基本语义要素。由此，我们必须对中国占卜文化中最基本的概念进行研究探讨，如“占”“卜”“筮”、“起卦”、“算”“证”、“候”等（Lackner 2007; Drettas 2007）。在占卜文化中，“时”的概念具有重要的作用。

虽然佛教与占卜文化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但是佛教对“因果报应”的道德观有决定性影响（Zhou Qi）。由此我们也将佛教的命运观纳入研究领域内。

为了理清这些基本概念，我们在研究中不但要借助于西方哲学（Forschner; Speer; Hoffmann，而且也要参考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伊斯兰教前的文化）。与中国文化相比，预言在中东地区文化中的地位更为重要，如对先知的形象的预言。对于命运与时间关系的思考（Tamer 2006），在阿拉伯文化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从十三世纪起有关这方面的思想被西方文化所吸收，这些思考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中命运与时间关系。伊斯兰教之前的阿拉伯语诗歌，是我们目前所知的阿拉伯文化中最早的典籍。在这些诗歌中，*dahr* 这个概念既表示“无尽的时间”又表示“命运”。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不可区分，“无尽的时间”和“命运”构成了一种不可见，又不可抗拒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dahr* 这个集“无尽的时间”和“命运”于一身的概念也出现在《古兰经》中。皈依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仍然继续相信他们受 *dahr* 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支配，而这种由时间与命运构成的力量形成了对唯一的主阿拉的挑战。于是一句借先知莫哈默德之口说出的格言告诉阿拉伯人：*dahr* 就是阿拉。这句格言将命运与唯一的主阿拉视为一体，告诫人们归根结底要服从的只是唯一的主阿拉。服从阿拉是伊斯兰教最根本的信条，“伊斯兰”在阿拉伯语中是“服从”的意思。

2.2.2 决定命运的机制和占卜活动的场所

决定命运的机制有哪些？决定命运的是天，还是鬼神，或是祖先（Friedrich 1995）？我们至今对《书经》中所提的“上帝”和“天”的关系所知甚少。在古文研究中，学者认为这两个词产生有先后。这个问题必须从哲学概念演变的角度来探讨（参见 2.2.1），同时这个问题也必将涉及宗教史和文化人类学。除了占卜文化之外，祖先如何对后人的命运施加影响，也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亡故的祖先与其后代的关系在许多方面离不开占卜文化，如先人的墓地后人要根据风水来选择。

占卜的过程具有宗教仪式的神圣性，事先要斋戒和祈祷，在某种意义上可与欧洲宗教仪式相比，如对圣人遗物的崇拜（Minois 1996；Angenendt 2007；Heinzelmann 1979；Swinarski 2000；Herbers 2000）。类似的欧洲宗教仪式总是在出现奇迹的墓地里或出现超自然现象的地方进行。而占卜的仪式一般在寺庙内或寺庙附近进行。在扶乩占卜的方式中，高层次神灵（降乩之神、乩仙）的参与是明显的，如关帝或其他的神灵附体于灵媒，灵媒或其他人将神灵的旨谕书写下来（Smith；Xu Dishan 1946/1999）。在早期的巫术文化中，巫术流传很广，但巫师大多不通文字。直到宋代，灵媒所传神谕才有文字记载（Tiziano Lipiello 2001）。占卜术与游戏的关系也是我们的研究的课题。在研究中，我们还要为以下一些问题寻找答案。梦受制于什么机制，是什么神灵的旨谕？用蓍草占筮，把蓍草分为两部分，这意味着什么？与高层次的存在形式（神灵）是否有联系？时刻在时间巫术中与高层次的存在（神灵）有什么关系？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是，在西方传统中，梦和预示未来的幻象是与另一世界沟通的途径。一些特殊做法如斋戒、祷告可引起预示未来的幻象（Dinyelbacher 2002；Moreira 2000；Burger 2003）。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要考虑：如何对这些主观感知的记录进行科学的研究并进行文化上的比较？

如果人们相信命运的可变性，就会寻找改变命运的方法，如驱邪辟邪的巫术（Angenendt 2000），或像哲人那样对命运变化泰然处之（Zhang Jianguo 2004）。巫术在我们的习惯用语中总是和神秘不可测连在一起，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将透视巫术和不可控制的险境之间的关系。

在拉丁语文化的西方，有一些地区是占星学研究的中心，同时也是神秘学和占卜术研究中心，如十三世纪之始西班牙的 Toledo（Sylvie Roblin 1989）。据说教皇格利高里七世（Gregor VII）曾在 Toledo 学习黑色法术。在有关人物事迹的民间文学中，如 Wolfram von Eschenbach 的《帕西发尔》，Toledo 学派的黑色法术被多次提及（Herbers 1999、2000）。人们对 Toledo 学派的黑色法术的关注表达了人们对这类神秘学知识的既怀疑、恐惧又好奇的矛盾态度。十三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阿拉伯文化典籍传入欧洲，神秘学被一些哲学家归入正式学科（Frank Fürbeth 1999）。自从 Toledo 学派的代表 Dominicus Gundisalvus 翻译了阿拉伯哲学家 Al-Farabi 的著作后，占卜术和巫术就被一些学者归入物理学的领域。在一部源于十二世纪，作者化名为 Pseudo-Turpin 的著作中，占卜术被归入“自由学科”，即培养个人文化修养的基础学科（Herbers/Santos 1998）。

无疑对占卜活动场所的地理分布的分析（从宏观及微观层面上），将找到和古希腊的神喻宣示所的分布有很多类比之处。这一现象的研究，将落实在项目的后期。

2.2.3 占卜术与理性

某些占卜术（时间占卜、内脏占卜、鸟群队形占卜、数字占卜）根据数据推断结果或对迹象、征兆进行诠释，这种方式在方法论上与现代的预测方式（天气预报、经济发展预测或医学诊断）没有本质的区别，这已经是我们的共识（Vernant 1994; Chemla/Kalinowski 1999）。占卜文化对中国历朝政治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Loewe 1994）。Kalinowski 把占卜术称为“中国的传统科学”。Sivin 在科学史研究中断定，大多数元代的天文学家在上任之前都从事过占卜活动（Sivin, 尚未发表）。从天文历法的制定，我们也可以对占卜术和帝制政治的关系窥见一斑（Lü Lingfeng/Shi Yunli 2002）。二十世纪前，中国文化的历史观与命运观是紧密相连的（Schaberg 2005; Lewis 1995）。基于以上的例子，我们在研究中必须关注一个问题：各种不同的占卜术是否具有不同程度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我们可以将基于演算方式的占卜术（如八字算命）与难以成系统的占梦方式（Lackner 1985; Drettas）作比较。对医学和占卜术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Marta Hanson; Sebastia Giraldo），即使在现代医学中，预测也是治疗的重要环节。研究占卜术的理性成分问题，我们应该参考古巴比伦文化。古巴比伦盛行占星术，对天象有系统地观测以预测吉凶（Francesca Rochberg）。

占卜术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门“软”科学，可以与用于诠释世界的人文科学相比。人文科学在英语国家中被称为“自由学科”，即培养个人文化修养的基础学科。

占卜术的物质即材料层面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课题。至今为止，人们对中国文化中历书的发展尚未作系统的研究（Morgan 1998; Smith）。越南文化可以提供有关占卜术与数学关系的资料（Volkov）。涉及西方拉丁语文化传统，我们有许多工作可做，如整理、编辑阿拉伯语、拉丁语和其他语言的有关历书、年鉴资料。

目前，风水占卜在西方已经风行到泛滥程度。在经济界流行的占卜形式还没有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我们对占卜术与科举考试之间的联系有所了解（Elman 2000），但是对占卜术与生意场之间的联系所知甚少。“发财致富”或“财富”等词随处可见，而我们对经济发展与占卜术之间的联系——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所知还远远不够。

2.2.4 知识精英对占卜术的态度

与进入现代之前的欧洲社会相比，中国社会的各阶层流动性大，家庭出身对个人的社会地位没有决定性影响。这种状况为个人的前程发展、命运预测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个人及其家族的升降沉浮总是发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这是现代社会之前，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最大的差异。在西方，即使不反对占卜术的人也强调其局限性，因为命运是由上帝安排的，而上帝的意志是“偶然（无常）”而不可测的。Ockham 曾这样说：很多事情万能的上帝可以做，但并不愿意做；中国文化中是没有“超越”（西方文化所谓的超越）意识的，占卜之书成为儒家典籍之一，这说明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并不从根本上质疑“命运可知性”。虽然他们当中不乏像王充（公元一世纪）那样的怀疑论者，只是这些人是宿命论者，认为对命运的预测毫无意义，因为在命运面前人无能为力，不具有能动性。

宋明儒学的代表人物如朱熹持另一态度。朱熹认为，人对自己命运的认识与对宇宙的气理认识不可分。通过对宇宙的认识，人们可以超越偶然的气禀定命而追求个人的道德完善。在研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那些对“命运可知性”的怀疑者，如王充、吕才或明末清初的吕坤、王廷相。还有一种对待占卜术的态度在民间宗教信仰者中流行。他们认为通过占卜术所得的神谕可以改变他们自己的命运。傅斯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不同的命运观及对待命运不同方式作了总结性的研究。他的著作是现代中国在这个领域内罕见的学术成果。

类似于拉丁语文化的西方，中国的文化精英从宋代开始对占卜术持审慎态度，这种变化主要归结于社会政治因素。国家官方的祭礼与占卜活动之间的关系随着朝代更迭而改变。在汉代，文化精英们的治学目标是为宇宙观与占卜术之间的关系构筑个天道系统（Loewe）。某些时期，一些被学者们承认的占卜方式由于政治原因被禁，有关占卜术方面的典籍（如讖纬文献、历法）不许私人收藏。国家并不反对占卜术，而是要控制占卜活动。尤其是敦煌文献表明，许多复杂或简易的占卜方面的书籍都是出于官拜朝廷的士大夫或地方官之手（Kalinowski 1993）。

有关占卜术的典籍自成一家，与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的典籍并列。有关占卜术的典籍有自己的独立传承，通过对典籍目录的研究和古墓的挖掘，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甚至战国时代。占卜活动通常是在一定的组织框架内进行的，或被纳入民间宗教仪式，或被纳入民间祭祖活动（Kalinowski 2003）。

我们在研究中要把中国文化精英们对占卜术的态度与西方文化精英对待占卜术和奇迹的态度进行比较。在欧洲，文化精英们对占卜术和奇迹的态度是各有所持。柏拉图学派与亚里斯多德学派不同，接受并研究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人又具有各式各样的观点。奇迹是超自然的现象还是符合自然的现象？奥古斯汀认为奇迹在自然现象的范围内。中世纪对奇迹的相信是否可理解为对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巫术的超越？这些问题一直被学者们激烈地讨论争辩。托马斯·阿奎恩认为所谓的奇迹不是我们人类所能感知和认知的普通自然现象，但仍属自然现象范围。他认为上帝不会让超自然的现象发生。托马斯·阿奎恩对基督教中奇迹的现象的理解是有限定的。但是，中世纪晚期那些对所发生的奇迹的记录是否符合这位经院哲学家对奇迹的看法？（Boureau 1995）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基督教文化中，相信奇迹并在理论上对其予以阐述的学者们都反对占卜活动。同时这也说明，占卜活动当时在拉丁语文化的欧洲是广泛流行的。一位名叫 Hans Hartlieb 的医生著书论述七门被禁的学科：尸占、土占、水占、气占、火占、手相、骨占。在西方占卜术被划归为巫术，其来源为古希腊罗马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十三世纪时达到发展的高峰。经院哲学家们把占星术划分为两类。自然的占星术观察星象研究其对潮汐、天气和其它自然现象的影响。迷信的占星术研究星象对人的行为的影响（Speer 2007）。个别学者，如 Albertus Magnus 或 Roger Bacon，对迷信的占星术却也推崇备至。在研究中我们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基督教的学者们对占星术持有这种前或矛盾的态度？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在中世纪，尽管占卜术广为流传，却被教会作为迷信而禁止（Harmening 1979；Bonney 1971；Bologne 1993/1995）。这种状态持续至今。在研究中，我们可以将中世纪禁止占卜术的理由与现今的禁止理由做纵向比较。

2.2.5 占卜术的资政功能

根据甲骨文记载，中国文化中政治行为与占卜术从商代（公元前十三世纪）起就密不可分。占卜活动是政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卜问的内容涉及战争、狩猎、统治者及家人的健康（Rédouane Djamouri 1999）。从汉代到唐代，甚至到中国帝制末期的明清时代，占卜活动也涉及政治决策和历法的制定，占卜术是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Loewe；Kalinowski 1991）。占卜术的地位和占卜活动除了有史料为证外，也在袁树珊的《历代卜人传》中有所记载。占卜活动成为政治预测、军事战略制定和统治者资政的枢纽，这种关系也在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如《三国演义》中在诸葛亮这个人物的身上就集中体现了这种关系。占卜术对统治者树立权威，做政治、军事决策有重大意义（Fröhlich 2006）。中国文化

的科举取仕制度延续到二十世纪，其中占卜术的资政功能和对历史进程的“可预测性”的信仰起了重大作用。源于早期儒家学派和其它儒家学派的知行统一的观点是否与占卜文化相关，这也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占卜术的资政功能是否经历了一个韦伯所理解的理性化的过程（韦伯认为，儒家学派的理性主义并没有真正脱离“巫术的花园”），这个问题至今还无人进一步探讨，值得我们关注。在晚清时期，西方学者将越来越多的天文学数据公布于众，这对在中国本是秘密学科的天文历法和天文学理论有什么影响（Marianne Bastide），这也是我们研究题目之一。

直到今天，预言家是统治者所信赖的人。极权主义与为政治服务的占卜术之间的特殊关系也是我们研究的课题之一。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Popper 和在他之后的学者们论述了集权主义和绝对真理的联系。集权统治者们总是致力于寻找终极的，不容置疑的真理，而占卜所得的结果可视为这样一种绝对真理。

在古希腊罗马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中，星座与其他圣物圣地一样受到重视。在拉丁语文化的西方，Macrobius 生活的时代，占星术已成为传统学科（Carmody 1956）。在十三世纪，西班牙 Kastilien 的国王 Alfons 十世把占星术作为重要的资政形式，而有关占星术的大量书籍主要是在西班牙的 Toledo 和其它地方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的（d'Alverny 1982; Tolan 1996/2000; Burnett 1996/2004; Benito Ruano 2000; Maser 2006; 参见 2.2.2）。

除了西班牙的伊斯兰文化地区和 Toledo 学派之外，Friedrich 二世治下的西西里也是接受和传播古希腊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中心。占星术在 Palemo 的宫廷文化中不但是宫廷仪式的一部分，同时对统治者的政治决策（如 Friedrich 的婚姻、Victoria 城的建立）起着指导作用（Caroti 1994; Manselli 1979; Rapisarda 2000/尚未发表的成果）。Friedrich 二世的资政官 Michael Scotus 是这个领域的专家（Morpurgo 1984; Burnett 1994）。Scotus 受国王之命著书撰写占星术的概况（大概在 1230 或 1235 年），他的著作可称作是一部有关中世纪占星术知识的百科全书。

2.2.6 现代社会中的命运观和预测

在中国，开始于十九世纪末的启蒙运动反对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希望通过对教育、语言文字方面的革新而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中国的知识分子致力于用“科学”来代替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秩序。尤其是 1912 年民国建立后，许多观念意识随着帝制政体的解体而逐步被消解，如天子、天命、国家宗教祭礼等。“科学万能”的观念甚至在政治领域内也占了

主导地位 (Fröhlich 2000)。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所谓“科学预测”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独特的魅力 (Fröhlich 2006)。对历史进程进行预测, 这项“政治任务”在启蒙运动之前却是由占卜者承担的。然而启蒙运动带来的这些变化并未从根本上彻底消解传统的命运观。在摈弃了儒家“修身养性”之说和民间日常生活中流行的占卜术后, 人们是如何看待“命运”的? 袁树珊是民国时期研究占卜术的学者, 著有《命谱》等书 (参见 Smith; Smith 的研究以袁树珊的《中国历代卜人传》为基础)。从《命谱》的几篇序言中我们可看出, 作序者们把“命学”作为一门学问来对待, 并将其与西方的“科学”加以区分 (参见 Liu Jianrong 2007)。从二十世纪初科普杂志《格致汇编》和《点石斋画报》所发表的文章和众多读者来信来看, 传统的命运观在人们的意识中继续存在, 并没有随现代科学知识的普及而消失 (Liu Yishan)。

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清除作为旧文化的占卜活动,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除四旧”运动期间。但是占卜活动以隐蔽的地下方式一直存在并保持了连续性 (Bruun 2003)。众多传记和自传性质的文学作品陈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如何应对变幻莫测的命运而度过灾难。这些传记或自传性质的文学作品是研究现代中国命运观有价值的资料 (Wang Liying)。

目前, 传统文化中的占卜术已成为中国大陆历史学家研究的热门话题。刘文英所著的《梦的迷信和梦的探索》对中国历史上的占梦活动进行了总括性研究, 在学术界引起相当大的反响 (刘文英; Lu Ying 2005)。只是近期以来, 越来越多的文章中出现“迷信”这样的用词。在中国三千多年的文化进程中对待命运的态度究竟对我们今天的影响有多大, 这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作实地考察 (田野调查)。在民间宗教研究中我们已经有一些实地考察的结果 (John Lagerwey)。我们还需要在中国做保险业方面的实地考察。

在我们的所列的书目中有大量解密占卜术或持批判态度的研究资料 (参见书目 2.2.4)。爱兰根大学日本学专业可为我们提供有关占卜术与日常生活关系的资料。台湾和香港拥有大量有关占卜术的书籍资料, 从事占卜活动的人也不计其数, 因为台湾和香港没有经过经过中国大陆那样的文化清洗。中国大陆最近对占卜活动的揭露、批判值得我们的注意, 这种现象起码说明占卜活动已经非常流行 (Guo Chunmei 2001)。《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几乎每一期都发表文章, “揭穿”当下流行的占卜术或与算命有关的迷信活动 (Li Zonghua 2005; Tang Libiao 2006; Wu Kui 2006; Wang Chunhua 2007)。

西方在近代的早期就开始对巫术、占卜术、女巫迫害从理论和法律的角度进行批判性思考。尽管如此，巫术的某些成分（如祈求上帝驱除恶魔）还是在教会的仪式或占卜仪式中保存下来，流传至二十世纪。这类形式目前有增无减。

2.2.7 历史观

从十九世纪起，在西方历史学家对过往时代从历史科学的角度进行观照，产生了不同的历史观脉络并以此超越了神学的历史观和循环历史观。我们目前所处状况是历史持续发展至今的结果，这一观点是对神学历史观和循环历史观从根本上的否定。然而，那些被否定的历史观仍然在一些思想体系中继续存在。

日本从西方接受了“发展”的历史哲学观（Kleinschmidt 1997/1999）。参照日本，我们在考察中国时所要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在二十世纪接受了哪些西方历史观思潮？（Lackner 2001/2003）只有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深入了解除马克思主义外其他西方历史观对现代新儒学的影响并对这些西方思潮与循环历史观的关系加以描述。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现代新儒学是最活跃的思潮。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纪中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研究，形成自己的现代化观念和对现代化进程的思考，而这些思考也是带有发展观色彩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现代化总是被理解成一个“追赶”的过程，而国家是这项“追赶”行动的领路人。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思考认为，现代化是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这个进程不是个人或集体作为行为的主体所能决定的。因而现代化进程对个人或集体来说只能是一种行为主体无法掌控的进程，是一种“偶然性（无常、无序）”的经验。与西方的主导思潮不同，新儒学认为现代化可以由“以德为本”的国家通过采取一定的“政治措施”来实现。这种现代化观念完全脱离了循环历史观，在理论上构建了一个具有道德自主性的政治集体，而这个政治集体是创造自己历史的行为主体（Fröhlich 2003/2007）。否认或忽视历史进程的“不可知性”即“偶然性（无常、无序）”是中国文化历史观的特性之一。我们必须在中国的占卜文化的背景下来理解这一历史观的特性。

我们在此只能初步推测，以上所阐述的历史观和现代化理论不只是在新儒学中，而是在整个东亚的哲学中得到表述。

3. 跨国项目的组织和工作计划

东亚传统的命运观与现代的观念相间并存，如果这个假设命题成立，那么亚洲学者参加我们的项目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但是政治意义上的文化交流的需要，更是研究方法所决定的（**Lackner/Werner**：研究的伙伴而非研究的对象）。在充满了文化禁忌的敏感领域内，我们期待通过东西方学者们共同合作而取得有价值的，不仅仅局限于文献研究的成果。

我们的研究目的决定了项目组织形式：爱尔兰根大学的汉学专业有三个教授职位（**C4, C3**，预备终身教职）。通过参加两个研究生班的科研教学活动及获得非国家审批的研究经费，汉学在该大学文科专业中有稳固的地位。爱尔兰根大学的中世纪史和早期近代史专业配有三位教授（中世纪史与文献研究：**C4, C3**；早期近代史：**C4**）。该专业负责一个研究生班，拥有可观的非国家审批的研究经费，参加德国研究协会（**DFG**）的有关文化交流与文化整合研究项目，重点研究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相遇后的文化整合及世俗化进程的问题。我们的跨国项目由这两个专业主持，研究的课题具有首创性，涉及预测的历史发展与命运观的文化差异。综合这些条件，我们的项目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将会引起一定的反响。我们将给我们的博士生们提供参加一周一次的研讨会的机会。

这种国际性的合作有别于一般的研究项目，在组织和工作进程上会有其特殊的问题。这方面我们有经验可以借鉴。由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支助的项目“国际质量网”在爱尔兰根大学进行了四年，先后有 25 位来自中国、日本和欧洲的访问学者在大学作长期或短期的研究。**Lackner** 教授在地区文化研究和其它文科专业的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Herbers** 教授近年来主持协调大的国际项目，研究的重点为世俗化进程以及中世纪西班牙半岛和意大利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化相遇后整合问题。**Fröhlich** 教授是爱尔兰根大学亚太地区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前面提到的两位教授也是这个研究中心的成员。）**Fröhlich** 教授重点研究现代中国。这三位项目负责人分属不同的年龄段。由于项目的课题庞大而涉及面很广，我们的工作要有系统地分步骤进行。

第一阶段：与命运和占卜术有关的概念（2.2.1）占卜行为的神圣性及其与宗教仪式的关系，决定命运的存在形式，占卜活动的场所（2.2.2）在此阶段中，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与西方哲学史和阿拉伯文化思想史的学者们共同合作，研究探讨命运观和预测的理论基础。这个阶段中，我们也将与莱比锡大学新上任的 **Clart** 教授合作。

第二阶段：占卜术与理性（2.2.3）知识精英对占卜术的态度（2.2.4）占卜术的资政功能（2.2.5）：意大利西西里的 Friedrich 二世，西班牙 Kastilien 的 Alfons 十世这三方面的课题研究将同时进行，我们希望以此对现代社会之前的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了解。这三个子课题与主课题的研究有直接关系。

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围绕“另一种现代化”的问题进行各方面的讨论：传统的命运观以及预测方式对当代的影响二十世纪的历史观进入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以及带来的问题，从文革经历的叙述出发来具体考察以上各个问题。